社会调查自白

怎样做社会研究

费孝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会调查自白

怎样做社会研究

费孝通 著

刘豪兴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调查自白：怎样做社会研究/费孝通著；刘豪兴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08-08544-2

Ⅰ.社… Ⅱ.①费…②刘… Ⅲ.社会学—研究方法
Ⅳ.C9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1486号

责任编辑　毛志辉
封面设计　王小阳

社会调查自白
——怎样做社会研究
费孝通 著
刘豪兴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635×965　1/16　印张25.75　插页3　字数373,000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
ISBN 978-7-208-08544-2/C·331
定价 36.00元

社会发展与社会学*

（代序）

听说北大新办了一个教授俱乐部，这是一个新的组织，教授之间可以在此互相接触，搞一个学术性的俱乐部，创一个新制度出来。我很赞成这个事情，也自愿来参加这个聚会。现在思想上的交流，实在太少了。学术的发展，北大的风气要提高一步，这个俱乐部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今天我讲什么好呢，就讲讲社会学吧。我是60多年前进入这个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来学社会学的，隔了一个甲子，能和同志们一起讲讲社会学，我很高兴，题目就叫《社会学与社会发展》。这个题目有两种讲法：一种是从社会学出发来讲对于社会发展可以做出什么贡献，做些什么事。今天我想反过来，讲讲《社会发展与社会学》，就是讲社会学怎么从社会发展中吸取养料来发展自己这个学科。我就讲我自己，用自己做标本，看我是如何从社会发展里边来构筑我的学术工作，在当前的激烈的社会发展和变化中间，来发展我的思想。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重建社会学。这是我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开始。正逢公社制度结束，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了集体主义的公社制度。当时我们中国的农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需要走新的路子。这就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开始。这是一个大转变。小平同志出了个主意，要恢复社会学，在学校恢复社会学，要教师，要教材。当时我想，教师可以从全国各大学的文科教员里抽调出来加工。所以我们办了几个短期学习班，请了美国和香港地区的学者来讲他们是如何搞社会学的；教材呢，就结合中国的实际自己来编。这是80年代重建社会学开始时的情况。

说起来，我们过去的社会学并没有结合中国实际。我在燕京大学

---

*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大学教授俱乐部聚会时的讲话。

念了三年，才有一个外国教授 Robert Park 来讲学，这是 1933 年。他说，社会学的资料在哪里呢，是在人的生活本身。每个人都在社会里边生活，没有一刻能离开它。他这一点提醒了我：社会学不能只在书本里去找资料，那是第二手的材料，而是要同自然科学一样，直接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他说你们要下到“人”里边去。他还带我们到天桥去，叫我们去看看和未名湖畔所见到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下子改变了我们对人文科学的整个的看法。现在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叫联系实际。你不能关了门，坐在屋里讲，不行。要直接去看，直接去听，同人们接触，同人们谈话。所以 Park 带我们到监狱里，到八大胡同去见见世面，让我们不要仅仅局限在自己熟悉的世界里。他对社会学又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我们直接去看社会，也就是要学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就是深入群众的生活，去了解社会活动的真情，然后去分析它的道理，多问几个为什么，要我们多动脑筋。这同自然科学一样，你要掌握很多数据，然后看出里边的规律来。

从 Park 得到这一点启发之后，我说我也要念点人类学。当时清华大学有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有个教人类学的俄国籍教授 Shirokogorov，中国名字叫史禄国。1910 年他从法国的大学里毕业，进入莫斯科的科学院，主要在西伯利亚从事通古斯人的研究。通古斯人居住在西伯利亚，那地方本来是我们中国的，后来给俄国吞并了。1917 年，十月革命后，史禄国在海参崴的远东大学教书，后来又来到中国教书。他在学术上有着很好的训练，同时又有扎实的调查资料，写了好几本关于通古斯人的书。我找到他门上去，安心地跟着他在清华念了两年体质人类学。我从清华毕业以后，于 1936 年到英国去学文化人类学。我的英国老师是 Malinowski，他和史禄国一样也主张实地调查。他说我们要进入不同民族的人的生活里边去，同他们一同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生活。在当时他是开了一个新的为学方向，新的风气。在这一个风气里建立了现代人类学，它的方法就是“field work”，我们叫做“田野工作”。

我在英国一直呆到 1938 年，根据我在江苏本乡农村里的实地调查写出了论文才回国。当时正值抗战，我经越南回到昆明。我就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两个学校教书。我们还在呈贡的魁星阁搞了一个调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研究所,主要的工作是下乡调查。沿昆明湖跑一圈后写了一本书,叫《云南三村》。那是张之毅同志和我一起跑一起写的。《云南三村》是讲内地农村的发展。从一个主要是农业的村子,叫禄村;到一个有简单的手工业如造纸、竹子编织等的村子,叫易村;一直到市镇附近的玉村。从一个完全是农业的,到有手工业的,一直到有商业的三种不同的村子,去看它们不同的地方。《云南三村》后来翻成英文,叫 ***Earthbound China***。这是我们第一段的工作,一个开头。那时还不是有意识地跟着社会发展在走,但是我们在理论上是把从农业到手工业到商业,作为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来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希望从实地调查中吸收养料来丰富我们的社会学。

解放之后我搞了一段民族工作,因为李维汉同志觉得我是研究人类学的,做少数民族研究工作正好对口,就把我从清华调出去,参加少数民族访问团。这一段的经历,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已经做了回顾。后来,1952 年搞院系调整,把社会学取消了。到 1957 年我被打成右派,编入另册,仅仅保留了教授的职衔。从 1957 年开始到 1980 年,这一段 20 多年的时间,我是在另一个社会里边生活,同普通人的社会几乎隔绝。直到 1980 年,才得到改正,开始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当时我下了个决心,说我大概还有 10 年时间,预备再干 10 年。我打了个比方,说我身边只有 10 块钱了,这 10 块钱不能拿来零星地买花生米吃,而是要买一件我所喜欢的东西。买什么东西,当时也没有说出来。等到 1990 年我 80 岁的时候,朋友们来庆祝我的生日,让我总结一下自己一生的想法,我说了四个字:志在富民。回想一下,我在我的第一本书《江村经济》里边就已经说过,中国的问题是一个饥饿的问题。因此我的一生,如果将来还有 10 年,那么这 10 年就要用来想尽办法把这个"饥饿"取消掉,可以说就是"志在富民"。

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时,我第一个课题就是开展关于"小城镇"的研究。80 年代,我在江苏的农村调查里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和公社制度之下,小城镇普遍衰败,人口大大减少。差不多同样时候,胡耀邦同志在云南考察,发现云南小城镇衰败的情形比江苏还严重,作为农村的中心,市镇几乎消失了。原因就在于农产品自由交换的功能已经被国营渠道垄断,造成了计划经济之下流通渠道的不畅

通，事实上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于是我决心研究小城镇。当时尽管小城镇很萧条，但它本身有个力量在恢复，是它自己的力量，不是我们的外力作用。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我是怎么抓住这个问题的。我到吴江的一个叫盛泽镇的丝绸中心去调查，同当地的领导一起谈话、聊天。我问他们这个镇上人口的情况。他们告诉我现在大概万把人。我说解放之前我来过啊，也说是万把人，怎么别的地方人口都涨了，而你们这个地方还是万把人？这个地方为什么人口没有涨？他说原因很多，一时也说不清。这个问题就一直留在我脑子里。紧接着就到过年了，我到了苏州，住在一个宾馆里。服务员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啊，好像很不高兴的意思。我说怎么了？她说你来了，我们不能回家了。她是盛泽人。她说他们过年都要回去，可是今年没法回去了。这几天车挤得不得了，车票都买不到。我问为什么那么挤啊。她说都要回去过年啊。我又问这么多人从哪里来的？她说在上海、无锡的人都要回家过节呀，所以不容易买票。这个巧了，我正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解放前十几年，这个小镇超过万把人，到现在 1982 年了还是 1 万多人，我要知道增加了的这些人到哪儿去了。现在我找到了，他们都出去了，有去上海的，去无锡的，去其他地方的，小镇里留不住人啊。但是过年过节他们还是再回老家的。这就是我跟着农村本身的发展去调查，从人口的变动里边看出一个小城镇的兴衰。兴衰的原因看来也很清楚，是因为我们流通渠道塞住了。本来小城镇是流通渠道的一个基地，一旦塞住，人们就跑出去了。可是中国人有个传统，家在那里，他过年还得回去。这是传统的力量，到现在我们还靠这个东西。许多侨资不断地流向国内，靠的是出去的华侨，他们要回家乡啊。

我就是在和一个服务员的谈话里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开了一个门。那么接下来怎么去研究一个镇呢。我决定从它的兴衰开始。开始先搞一个提纲，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吴江县的七个大镇和许多小镇。我团团跑了一圈，一个镇一个镇去看，看它们的变化，最后总结出一篇文章，叫《小城镇 大问题》。这篇文章，胡耀邦同志看了很高兴，让大家都看一看，所以出了名。

讲这个例子我要说明什么呢？我是要用它来说明是社会发展带动

了我的社会学的研究。假如没有这个实际的发展,我就进不去这个门,也不会去研究这个问题。事实上小城镇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又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关系到人口的布局。我们农村里几亿剩余劳动力要出来,吸收在哪里呢?当然最主要的是要限制人口,要计划生育,就是要少生点。可人还是要生出来,人口还在涨。大城市吸收一个人至少要几万块钱。比如北京或者上海接收一个人,要给他住,要给他行动,工作场所,建筑和道路等等,都要花钱的。没有巨大的投资是不可能产生大城市。所以接收不了农村里全部的多余人口。这批人到哪儿去,放在哪儿呢?我就想,不是可以放在小城镇里边,让它成为一个人口的"蓄水池"吗?这就是小城镇现在起的作用。现在看来,过年过节,坐车很挤,可是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从农村里流出来的人口没有全部到大城市里边来。什么地方截住了呢,小城镇截住了。我在《江村经济》里计算过,按当时的技术只需要 1/3 的劳动力就可以耕好田,多下来 2/3 的人口是吸收在副业里边。可是吸收在副业里还不够,他们就开始搞工业。开始工业是在村子里搞,逐步就转移到小城镇里来。因此小城镇的发展是解决中国很多发展中问题的一条路子,也是富民的一条路子。

我今天讲的这番话,说明我的这些想法并不是从书本里边看出来的,而是在实际生活里看到了小城镇的作用。我再讲一件早年发生的小事。我当时是很喜欢抽烟的,第一次去江村调查的时候到小店里去买烟,店主问我买几支烟?我说买一条烟行不行,他不卖,一盒都不卖,要买几支可以。我觉着有意思了,这么一个有几百户人口的村子,为什么烟要一支一支零卖呢?碰到了这么一个问题,我没有放松,我问他,你们自己要抽烟怎么办?他说客人来了,我们一支一支买。要多的,就叫航船去镇上代买。这是解放之前的事情,那时我们水乡一带,为什么市镇很发达,成为周围许多村子的流通中心,是因为它有一套流通的渠道,一个航船系统。江苏水乡交通工具主要是靠船,航船是专门来往于村庄和市镇之间的公共交通工具。航船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为村民们到镇上代买日用品,另一个是在农副产品购销上充当村民和商家的中间人。从这样一个制度中,我看到了市镇在农村的流通渠道里边的作用。解放之后航船被取消了,靠单一的供销社供应,流通渠道不

畅通，再加上种种限制，于是小城镇萧条了。

所以我认为，要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农村经济，必须抓住农村的流通渠道，这就是要发展小城镇。现在大家逐步明白了，大概这条路子是对的，中国发展的道路必须从乡镇企业到小城镇。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从外国照样搬来的东西，而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发展的现象。我们从事实里把它提炼出来，再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分析出道理之后，再回到实际社会中去，推动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所以我们社会科学家，应当做群众和政策之间的一个纽带，从实际情形里边去发现问题，再反映到党的路线和政策上去。

我讲的这些话是想说明我们社会工作者要一路看生活，看具体的真正碰到的人，从里边找出一个真正的道理。这就是社会学。社会学离开了实际接触人，不可能有什么新东西出来。生活里边有道理啊。当前我们正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发展的时期，我们要好好理解它。这 16 年来，我就是跟着这个发展，从村，到镇，到城，最后到区域经济，一路看它们是怎样发展的。最近乡镇企业都在那儿找外资，搞合资企业。合资确是解决了乡镇企业的资金问题，使它能维持、发展下来。但是这么一来究竟有什么意义？要研究，要想一想。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叫《有名无实的国家》，是讲跨国公司的网络。这个经济网络已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力量，超过了国家拥有的企业。现在全世界跨国的金融资本实力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因此，我说它不是“有名无实”，而是“有实无名”，实际已经出来一个超过国家的经济实体，一个经济实力很强大的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的联合体。它有什么意义？我们北大还没有人去研究。这篇文章又提到了一点，说这个跨国经济网络现在正在同以民族为基础组成的国家发生冲突，和国家的主权概念相冲突。这是一个新问题，一个大问题。这个跨国家的实体正在形成和变化之中，这就需要我们社会学家去研究。这是我对年轻学者的期望，也是为了要说明今天我讲的主题，就是社会总在发展变化，而我们学者的任务就是要紧跟着现实的变化走，去抓住它。

1996 年 12 月 6 日

目　　录

社会发展与社会学(代序)/1

社会调查自白/1

社会调查自白/3

一、引子/4

二、社会调查概述/8

三、民族调查/17

四、农村调查/24

五、家庭调查/34

六、小城镇调查/41

七、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50

八、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58

社会研究的意义/67

社会研究中的价值问题/69

社会研究能有用么/71

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73

中国社会学的长成/84

为社会学说几句话/92

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97

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从三访“江村”说起/105

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114

为什么要开展民族学研究/126

深入进行民族调查/129

谈社会学的建设问题/136

迈开社会学研究的新的一步/142

瑶山调查五十年/146

接受福冈亚洲文化奖的讲话/154

社会研究的方法/159

社会研究的程序/161

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167

社会研究的关键/171

伦市寄言/173

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变迁/191

亦谈社会调查/200

社区研究是社会学的一个趋势/206

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213

怎样开展民族研究工作/215

农村调查的体会/224

怎样去了解中国社会/237

谈民族调查工作的微型研究/244

谈谈我是怎样搞调查的/24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怎样进行社会学调查/253

再谈怎样进行社会学调查/265

怎样找问题/273

谈社会调查/284

民族调查工作不能脱离实际/288

从“江村”到“温州模式”/293

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299

关于学习风气和田野工作/307

深入社会　深入生活/312

方法论与古代文明/318

社会研究个案的书前书后/323

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的前面/325

《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327

《禄村农田》导言/331

《昆厂劳工》书后/336

《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变革》序/362

《云南三村》序/366

《云南三村》英文版导言/373

编后语/391

社会调查自白

社会调查自白

1984年7月23日到8月4日的两个星期里，我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里作了有关社会调查十讲。盟中央组织这个讲座的目的，是在贮存和扩散老一辈学者致力一生所得的一些知识，免得失传，有损国家的智力资源。我虽是这个讲座的倡议人之一，但是自问论资论学都够不上格，只是主持其事的钱伟长同志一意坚持要把我列入讲员之列，实在无法推托，勉为其难，滥竽充数，自觉惭愧。我所做到的只是在相当炎热的气温下，总算没有迟到，没有缺课。至于所讲的内容，只是些平时我常讲的有关本人从事社会调查的经过和体会的话。

我在课堂上讲话的习惯是事前大体上打一个腹稿，上场后即兴发挥，缺点是不拘章法，不求面面俱到，长处是不受框框限制，使一些听众受到言外的启迪，激发自主的思考。这十讲并非例外。我只把自己过去所做过的社会调查编排个次序，从民族、农村、家庭、小城镇到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各讲一讲。讲我为什么想到做这些调查，怎样调查，又有什么体会。另有两讲是答复问题，共十讲。其中并没有多少技术性的指导，也说不上有什么高深的哲理，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自白罢了。

我讲话时录了音，讲完后请听我讲座的上海大学李友梅同志，根据她的笔记，参照录音，整理了一个稿子。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足足花了有一个星期的紧张劳动，是很辛苦的。我在此表示我的感谢。稿子到了我手上，照例压积在我的书桌上，腾不出时间来校阅。入秋，上海大学沈关宝同志来北京，我就抓住他帮我把这份讲稿看一遍。他觉得对具体的社会调查方法讲得太少，所以把第二讲重新编写一遍，补足了我这次讲话中的一些缺漏。同样要向他表示感谢。直到冬尽春至，跨了一个新年，我才挤出时间修改了一次。错失和疏忽的地方还是不少，只

能请读者多多关照了。

一、引　　子

为了在中国智力总库里留下老一辈知识分子学术生涯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为了我们这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绵续长存的社会，民盟中央举办了这次“多学科学术讲座”。来这儿听讲的有全国各地的同志，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和讨论，我非常高兴，希望能得到好的收获。

我们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正需加速智力开发以缩短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因此，科学地培养人才，合理地使用人才，就成为我国在全球性挑战中能否取胜立足的关键，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一项任务。人才培养，智力开发，要靠我们已有的智力库。在我们现有的智力库里，七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已经为数不多了，而且属于他们未来的时间也不多了，这是自然法则，不可抗拒。我在 1980 年时说过一句话：“大概我身边只有 10 块钱了，一年用 1 块钱也只能用到 80 岁，到那时就做不了什么事了，即使活着也顶不上大用，用起来或许还会害人。”这样说是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时间有一定的年限。这一点是年轻人感觉不到的，青年人往往把自己的生命与无限的时光等同起来，其实二者不是一回事，有时还会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日本电视剧《血疑》用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的时候会怎么样？这里不但有自己怎么办的问题，也有别人怎么对待的问题。这部影片的主题给人以不少启发。

70 至 80 岁的这辈老知识分子的时间虽不多了，然而他们在中国智力结构里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们受过严格的、有系统的教育，大都学有专长，各有成就。他们毕生积累的做学问的经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财富。现在他们年事已高，来日不多，再不把宝贵的知识传给后人，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接班人的培养造成无法填补的损失。人死了，他的知识也随着去了，这是很可悲的。要知道，任何知识都不属于哪一个人私有的。它是全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是共同智慧的结晶。个人从社会里得来的知识应当回到社会里去，这就要靠代代相传。后一代要在前一代人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更新发展。

这是一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过程,而不是计算机或电脑所能替代得了的。因此对老一辈本身来讲,除了充分发挥余热,继续做出贡献外,还必须主动地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得以延续和发展。

这部分老知识分子大多毕业于抗战之前的高等院校。那时有不少学校有浓厚的学术空气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在学校念书,也都有各自爱好的专业,大多能在博览各种书籍、广泛而又迅速地接触各门知识的基础上专门化。这种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二者相辅相成的知识传递方式,使学生一走出校门就能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因此,尽管此后战乱不断,社会环境险恶,大部分人还是在科学领域做出了成就。可惜的是,全国解放后我们对科学文化学习、传授的规律性东西不予重视。相反,在 1952 年全国大专院校作院系调整以后,理、工科分家,文、理科分家,搞专科分院制。学习各门专业的不强调普通数理化的基础,更谈不到文史的基本知识。攻读文科的不了解当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进入了一个专科就不管其他科目了。学校的规章制度还限制了其他方面学习的机会和条件。过去清华、北大的课程就不像现在这样限得死死的,那时鼓励学生在学完必修课的基础上跨学科听课,窗台上都有人趴着听课。只要学校承认你是它的学生,听哪门课都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空气自然也就浓厚起来。大家碰头就能谈论交流,念人类学的遇上学语言学的马上就会说到一起去,和学生物的也能讨论一番。

所谓学术,就是人对宇宙实体的认识反映,物质和精神世界本身浑然一体,并没有分门别类。当然人在认识它的时候必须有分析,要有先后次序;人们之间还要有分工,各有偏重,但人为分割的各部分之间是互相联系着的。假如我们把这种分割绝对化,单刀直入,只专一门,在某一个孤立点上做学问,那么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客观世界存在的奥秘,也就不可能有新的学术成就可言。比如学写文章应当学会写杂文。学术研究也应当搞点“杂文”。“杂”,就是多样化,多种学科的互相交流,互相渗透,融会贯通,全面发展,这样才能有学习和研究的深度。

当年,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就我自己来说,我的底子就不是现在一般的底子。我学医预科是准备上医学院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